

试评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范立军

【内容提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他向清政府提出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首开以派留学生的形式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而开中国学子出洋留学的先河。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虽因历史原因而流产，但首批出国学习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人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向外国学习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是向封建旧传统教育提出的挑战。

容闳(1828—1912年)，广东省香山县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自少年时代起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50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他竭力主张并促成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后来又投入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他又同情革命，拥护民主。后因被清政府通缉，移居美国。著有《西学东渐记》一书。综观容闳的一生，他始终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进步，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最早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本文拟对此作简要的述评。这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认识近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的作用，或不无助益。

一、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产生、实施及其夭折

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最早形成于留学美国之时。容闳从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去美国学习，到1854年回国为止，在美留学8年。8年的留美生活在容闳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此期间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

化，成长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正值19岁到26岁，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而此时又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发展的时期，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早的工业区，各种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使容闳赞叹不已。而此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对此容闳常常“怏怏不乐”。^①美国的繁荣，中国的落后，两种客观现实印于容闳脑中。他向往美国的富强，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他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政、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②因此，他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外国学习。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会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先进，回国以后，便大力促进留学运动。1868年1月，他提出了以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计划”，在上清政府的呈文中，建议清政府“选拔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并附上派遣办法：初次可先定120名以试行，分为4批，每年送30名，以15年为留学期限。学

生年龄以12至14岁为度。视第一、二批学有成效,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使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学生的膳宿入学等事,另设两名留学生监督以管理。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用。这一方案因当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丁忧回乡而被搁置下来。

1870年6月,发生了“天津教案”,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前去处理,由容闳任翻译,他乘机向曾国藩再次提出他的“教育计划”,经过丁日昌的游说,加上容闳的“西学东渐”主张符合曾国藩“求强”的意愿,而《中美续增条约》也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⑧所以,曾国藩表示愿意联名向朝廷奏报。容闳用了两天时间,代曾国藩起草了一份奏折,这就是1871年9月3日由曾国藩等人上奏的著名的《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其中详细地规定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回国后的待遇及遵守的规则等。

1872年2月,曾国藩再次上奏,促使官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具体落实。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驻美留学生事务所的正、副监督。当赴美留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容闳启程先行到美国作安置工作。同年8月,第一批赴美学童(包括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等)由留学生监督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随同前去的还有翻译和汉语教师3人。自此到1875年,先后4批120名学生,全部赴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容闳为之努力了近2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之事实,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⑨但是,容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在不触动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即使此项计划能够实现,也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他也没有想到,在实施此项计划时会遇到封建顽固势力多么大的阻力和破坏。因此,其“教育计划”的夭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容闳的“教育计划”是把留学生从幼童时代就送往国外,而且把学习期限定为15年,其用意就在于使这批学生能摆脱旧意识的影响和束缚,把他们培养成为完全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

识分子,使他们懂得世界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能力。曾国藩虽然同意这项“教育计划”,可是洋务派心目中的培养目标,却与容闳不一样。他们是要培养一批略懂洋务而效忠于封建制度的知识分子,回国后为洋务企事业效劳,以巩固清朝封建皇朝,并不希望对中国实行真正的改革。至于清朝政府中的封建顽固势力,不仅竭力反对青年出洋留学,而且对留学生造谣中伤,捣乱破坏,胡说留学外洋是“离经叛道之举”,“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⑩这是导致容闳“教育计划”夭折的内因;而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大资本家为了转移视线,归之为华工的增加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于是出现了一股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他们的歧视。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已中学毕业,成绩优良,容闳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准备送他们进陆海军专科学校深造,不料美国国务院复信给容闳说:“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这种轻蔑之词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污辱,也是对《中美续增条约》中关于派遣留学生条款的践踏。为了让留学生继续学习下去,容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李鸿章,并希望他出面与美国政府交涉,但李鸿章回信说毫无办法。

这样,内有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外受美国政府和资本家的排斥,留美学生困难重重。但是,平心而论,美国只是不许留学生进军事学校,并非驱逐中国留学生回国。如果清政府有坚持让留学生学完15年的决心,敢于和美国政府据理交涉是完全可以坚持下去的。可是,李鸿章等人既不敢和美国政府正面交锋,又惧怕留学生学异忘本,所以幼童们的被撤回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结果使容闳筹划、实施多年的留学生“教育计划”遭到摧残而夭折。留美学生于1881年分3批回国,留学生事务所也同时撤销。容闳多年奔走、经营的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事业就这样毁于一旦。当时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对此极为感叹,他说:“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极佳,当时就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功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误中外。”^⑪事实也正是如此,从1872年开始派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去美国,到1881年仅9年时间,离预定第一批留学生回国期限15年,尚差6年。在

这9年时间里,中途辍学或患病去世者共25名,尚有32名在中学读书,60名在大学读书,大学毕业的只有2名,他们是詹天佑和欧阳庚。因此,中途将留美学生撤回,实在是可惜。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人才的严重摧残。

二、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评价

如前所述,容闳企图通过他的“教育计划”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与抱负,结果成为一场黄粱美梦而夭折。但是,这一计划在中国历史上毕竟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首先,我们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演变历史去考察,就会发现,容闳这种利用留学教育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文明富强之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开拓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30年间,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并开始走向世界的序幕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雨腥风面前,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思想政治家对传统开始了反思,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士大夫们不得不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思考如何向“蛮夷小邦”学习,使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思想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火花,使旧观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缓慢地更新。以对乾嘉学派的怀疑和批评为契机,今文经学派蔚然兴起,龚自珍和魏源成为两面旗帜,使经世致用思想逐步推而广之,人们开始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魏源的思想较龚自珍开放得多,又具有一定的世界知识,他在宣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同时,曾建议清廷在福建、广州等沿海地方设立考“洋学”的专点,以培育新式人才。然而曲高和寡,未能变为现实,仅作为一种光辉的思想资料保存了下来。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由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主张的同时,已触及到了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尝试,但农民阶级的思想决定了只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的治国方案,不可能出现容闳那样的使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社会那种设想。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曾提出过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纲领——《资

政新篇》,但和容闳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没有提出以“西学培养新式人才”这个在近代中国带全局性的问题。在此期间,还有一位冯桂芬,在上海较早接触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呼吁改革现状和向西方学习。但从总体来观察,冯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是支离破碎,难成体系的。和洪仁玕、冯桂芬几乎同时的,另有一位蒋敦复,流落上海期间接触了来华的传教士和西方文化,是近代较完整地描述西方政体的第一人。但他们是隔岸观火,只是接触到了一点皮毛的东西。总之,魏源、洪仁玕、冯桂芬、蒋敦复等人的言行,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轨迹。但是,这些人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对西方的了解是片面的,许多论述也是不成体系的。容闳则由于有赴美留学的特殊机遇,又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的世界知识和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上述诸位学者、思想政治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在19世纪50年代,容闳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中国人,是中国近代富有开拓精神的第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西学东渐”中高人一等,没有简单的把这项工作归结为译几本书,介绍一些知识,而是想到和具体做到了从培养人才着手。因此,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破天荒的一个创举。

其次,这一“教育计划”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挑战。中国封建教育的目的,所谓教忠教孝,完全是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服务的,教育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的死教条,还加上适应科举需要的八股试帖之类的东西。教育方法完全是灌输教条和箝制思想。这种教育到清代末世仍居统治地位。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西方思想逐渐输入,封建教育的弊病暴露无遗。接着洋务派推行洋务教育,如开办学堂,聘请洋人教习等,为他们的洋务事业培养工具。但他们的教育方针,仍然坚持“道不可变”的主张,封建性非常明显。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而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③他同时攻击维新派提倡新学为“不知本”,说什么“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④所以,洋务教育归根结底只能是封建教育的小兄弟,对它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而容闳规划的留学生教育,其

培养目标是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而不是封建专制的奴仆。因此，尽管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没有完全成功，学生未能完成学业，但他们毕竟受过若干年的新教育，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知识。他们在我国近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批留学生由于在美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一到国内就大显身手。李鸿章都承认这些学生“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均能深明窍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官兵，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⁷⁰李鸿章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⁷¹可见这批留学生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至于詹天佑对中国铁路的卓越贡献，邝荣光发现湘潭煤矿，许多人为中国海军的建设贡献了青春，有的还在对外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教育家和铁路、电报、开矿等方面的专家，那就更值得肯定了。据有人统计，这批留学生后来在中国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吴应科是舰队司令，徐振鹏为海军次长，其他海军将领14人，其中有7人牺牲于中法、中日战争；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唐国安；从事铁路、电报事业者30人，其中有6人是工程师、3人是铁路局长、9人是工矿企业的负责人；从事行政、外交者24人，其中唐绍仪是内阁总理，梁敦彦、梁如浩、蔡廷干都任过外交总长，还有外交次长1人，驻外公使2人，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从事金融商业者7人，其中钟文耀是上海华商银行行长，吴仲贤是江海关监督。⁷²总的看来，这批留学生除早亡和埋没故里者外，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为政界知名人士，或为军、学、商界要人，或为重要科技人才。其中除个别人和反动势力结合在了一起，绝大多数都千方百计地为中国近代化作贡献。

第三，容闳“教育计划”某种程度的实施和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的派出，对当时弥漫于中国的顽固守旧风气是一次沉重打击，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此后，1875年有人赴法国留学，1876年人

有赴德国学习，1877年福建船政局又派30名学生往法国学习船政，1896年又开始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留学生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到欧美、日本这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仅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且痛感自己祖国的衰败和清朝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许多人出国留学的结果不是变为清政府的奴仆，而是成为反清革命的战士。近代的许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从留学生当中成长起来的，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留学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容闳的“教育计划”并没有完全失败。

但是，容闳的留学生“教育计划”也有它的局限性。

其一，它具有空想性。容闳“教育计划”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在当时中国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内有封建专制的严密控制，单靠兴办新式的留学教育是不可能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祖国腾飞的。因而，这一“教育计划”具有空想性。

其二，对西学与中学的矛盾关系处理失当。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很大的自身继承性和很大的稳定性，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容闳由于自少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又长期在美国生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所以他没有把西学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很好地有机结合起来。这样，西学输入中国，其影响也必然有限。

然而，瑕不掩瑜，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有它的局限性，并且中途夭折了，但无论如何，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是由容闳披荆斩棘开创出来的。正如《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的作者舒新城所指出的：“无容闳，虽不能说一定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事实确实是这样，容闳在一百多年前为“改造和复兴中国”，敢于冲击封建统治者长期延续的思想上的闭关政策，主张通过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培养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文化科技人才，这是难能可贵的。